

古代东南海洋性瓷业格局的发展与变化

吴春明

(厦门大学 历史系,福建 厦门 361005)

[内容提要]陶瓷是古代中国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手工业产品,中国陶瓷主要是通过海洋传播和影响世界,我国海洋性瓷业中心是浙、闽、粤、赣等东南沿海。环中国海沉船瓷器和国内外陶瓷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东汉六朝时期东南沿海青瓷业经济与贸易体系的雏形已经形成。隋唐宋元时期东南青瓷、青白瓷、黑釉瓷等主要的海洋性瓷业生产规模急剧扩大并向内陆腹地广泛辐射,海洋经济地带从东亚岛弧地带急剧扩张到印度洋两岸地区,华瓷经济与贸易体系逐步进入了繁荣发展阶段。明清时期以东南青花瓷为代表的海洋性瓷业持续发展,并伴随着东、西方海洋势力的变化消长,青花瓷的海洋辐射范围从印度洋两岸推进到了大西洋两岸,凸显东南海洋瓷业的强大生命力和对世界的影响力。

[关键词] 东南;海洋;瓷业

[中图分类号] K2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22x(2003)03-0033-09

陶瓷是万年以来人类文化的重要创造,大约距今9000-8000年间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和我国东部新石器早期文化中大致同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陶器作品。中国是古代世界陶瓷业发展与对外传播的中心,约在距今5000-3000年间的龙山时代和商代,东南地区百越先民相继发明了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东汉、六朝时期江南青瓷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瓷器品种,并在整个古代史上延续发展为东亚瓷器工艺的主流形态之一。隋唐宋元时期是我国瓷器工业繁荣发展的重要时期,青瓷窑业迅速扩展到大江南北,东汉出现的黑瓷和北朝晚期出现的白瓷工艺在南北间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并逐步形成“南青北白”的总体格局,在融合、发展过程中又形成青白釉、褐釉和红青混合的钧釉等特色瓷种穿插其间。彩瓷是中国瓷器发展到后期的时尚,唐宋时期白釉下褐、棕、绿、青等单色彩瓷并不十分普及,但在元明清时期青花瓷器几乎一统天下,即便晚明清代锦上添花的三彩、五彩也不能撼动青花瓷器在明清瓷国的统治地位。

中国陶瓷丰富多彩的内涵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中国陶瓷精湛的技术工艺也持续领先于世界,并长期为远近诸番所仰慕,所以中国瓷器从出现的第一天起就开始通过海洋持续地对外影响和传播,海洋性瓷业分布的中心是浙、闽、粤、赣等东南沿海地区。环中国海历代沉船船货瓷器和国外考古发现的中国陶瓷的研究表明,汉晋六朝时期,东南越窑的青瓷、黑釉瓷等就已经先后从海路传播到日本列岛和东南亚群岛。隋唐之际,华瓷开始大规模从海上舶出,从环中国海的日本列岛、台湾、菲律宾、印尼群岛、马来半岛扩展到印度洋沿岸的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波斯湾、红海、北非和东非各地,浙江越窑、湖南长沙窑以及闽、粤等地的窑口的青瓷产品是海上舶出的最大宗商品。宋元时期,华瓷的舶出达到了古代史上的高潮,瓷器舶出地在隋唐的基础上,从环中国海到印度洋沿岸各地的纵深区域发展,品种类型更加多样,瓷器的产地和舶出的数量激增,主要有浙江和闽、粤沿海的龙泉窑系和仿龙泉窑的青瓷系,江西景德镇青白瓷和闽、粤、赣、皖仿青白瓷系,还

[收稿日期]2003-03-14

有建窑的黑瓷系、定窑的白瓷系、磁州窑的白地黑花系等。明清时期,华瓷的海外贸易进入了持续发展和变迁的阶段,由于洋船的东进,华瓷舶出的地区从东亚岛国至印度洋沿岸间扩展到北大西洋两岸,赣、闽、粤的青花瓷器成为海洋输出的主要瓷器类型。

古代东南外向型陶瓷的生产、集散、海上流通和国外销售是一个巨大的海洋经济与贸易体系,从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反映了以我国东南沿海为中心的环中国海海洋社会、经济与文化圈的构成和内在运作。我国古代外向型陶瓷在大陆上的生产、运输依托着以东南沿海为中心的、扩散到整个东部沿海地区的广阔海洋经济腹地,而其海外辐射范围也从环中国海逐步扩展到印度洋、大西洋沿岸地带。因此,古代东南陶瓷的生产和舶出不是一个简单的海上经济、海外贸易问题,而是一个将陆、港、海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海洋性社会经济体系。

一、东汉六朝海洋性青瓷业产销格局的初现

东汉六朝时期的外向型瓷种主要是青瓷,较少黑瓷。考古调查发现的东汉青瓷手工业窑址集中分布于浙江的上虞、宁波、永嘉、余姚和苏南宜兴等地,尤其上虞的东汉青瓷窑址分布密集,三国至六朝青瓷窑址扩散到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四川等地,但仍以浙江的青瓷窑址数量最多,上虞、宁波、余姚、鄞县、萧山、金华、永嘉、余杭、德清、吴兴、临海、绍兴、丽水、奉化等地都密集地分布着吴晋六朝青瓷窑址,这些青瓷窑址不少还兼烧黑釉瓷器,常见汉晋六朝间不同程度地持续烧造的,有些延续到隋唐时期还有生产。^①浙江以外散布的青瓷窑址只是零星的,如江苏宜兴、江西丰城、福建福州、晋江、湖南湘阴、四川成都、邛崃等,广东的南朝墓中也有同时期的青瓷发现,一般认为也是当地青瓷窑址的产品。可见,东汉六朝时期的青瓷、黑釉瓷两种瓷业主要分布于浙、苏、赣、闽、粤沿海地带,形成一个在东南沿海连片分布的、相当广阔范围的外向型陶瓷经济腹地。

在环中国海的沉船遗址中,最早的船货瓷

器就是出自这一外向型陶瓷经济腹地的产品,这就是西沙北礁沉船群遗存中的六朝青瓷小碗和六系罐,被认为是六朝时期广东窑的产品,稳妥地说应是六朝时期浙、闽、粤沿海外向型产业带出产的青瓷船货。而从这一初步的青瓷产业地带向外展开的扇形的环中国海岛弧上,也发现了一批同时期对外输出的东南青瓷遗存,如日本爱媛、奈良等地分别发现了东晋、南朝的越窑青瓷四系壶,印尼爪哇、加里曼丹、马来亚彭亨等地也发现了不少同一时期的青瓷器物,被认为是浙、闽、粤早期青瓷窑口的产品。^②

连接东汉六朝时期的这个以青瓷生产为代表的南向型经济地带和环中国海海洋世界的海陆枢纽是番禺、东冶和会稽等东南沿海早期港市。番禺港起源于商周,为南越人开建,西汉前期为南越国都,西汉后期平南越为南海郡治,东汉、孙吴时相继为交州、广州治所,并逐步发展成为南方第一大港。《史记·货殖列传》说:“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扬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汉书·地理志》载:“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东冶本是闽越国都,秦立闽中郡为治,汉为会稽郡下冶县治所,汉唐间一直是东南沿海的重要口岸。《后汉书·郑弘传》载:“建初八年,旧交趾七郡献贡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三国时,故冶县地置建安郡,《三国志·吴书·孙亮传》载:“从建安海道,皆就合浦击交趾。”这些早期港市在东南早期海洋经济带的构筑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纽带作用。

可见,东汉六朝时期青瓷产品在东南沿海地区的生产形成了一个初步的产业带,相联系的是这类产品在环中国海岛弧地带的初步的传播、扩散,联系汉晋南朝时期以东南沿海东冶、番禺等早期海港为中心的四海航路和早期航海开辟,这一系列经济现象绝不是孤立的,应反映了一个内在关系密切的、海陆互动的经济体系的初现,一个以东南沿海为中心的、陆港海相连的华瓷经济与贸易体系的雏形已经形成。

二、唐宋时期东南青瓷、青白瓷业产销体系的扩张

隋唐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瓷器生产繁荣发展的盛期,根据沉船与国外发现的材料,这一时期流通海外的外向型瓷器的主要品种是各地的青瓷系、青白瓷系,黑釉瓷系、白瓷系、白釉黑花系等也不同程度地纳入外销的渠道。考古发现的这些外向型瓷系窑口的密集分布区从浙江扩展到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沿海和江西,外围的湖南、河南、河北、陕西等十多个省区也有不同程度的发现,每种瓷系的产地分布十多个县甚至上百个县不等,窑址达数百甚至上千不等,充分反映了隋唐宋元时期以外向型瓷业为代表的海洋经济腹地的扩张。

直接延续东汉六朝青瓷业的工艺传统和主流格局,隋唐宋元东南瓷手工业和外销瓷的大宗仍是青瓷系,尤以浙江越窑—龙泉窑系统的青瓷为上。浙江不但是东汉六朝青瓷的故乡,还不愧是隋唐宋元青瓷的帝国,已经发现的以越窑为代表的唐五代青瓷窑址分布于境内的上虞、余姚、宁波、临海、金华、丽水、永嘉、温州、东阳、诸暨、嵊县、仙居、庆元、吴兴、象山、鄞县、奉化、瑞安、黄岩、兰溪等二十余县市,以龙泉窑为代表的宋元青瓷窑址分布于龙泉、云和、遂昌、丽水、永嘉、庆元、杭州、临安、余杭、上虞、宁波、余姚、慈溪、鄞县、临海、金华、瑞安、温州、东阳、兰溪、武义、诸暨、黄岩、嵊县、新昌、仙居、文成、泰顺、江山等三十余个县市。浙江的青瓷窑址几乎占据了同期全国瓷窑总数的半壁江山,上述每个县市内的青瓷窑址都有数十至二、三百处不等。福建、广东的青瓷窑址仅次于浙江,福建晋江、南安、同安、厦门、漳浦、永春、宁德、闽清、闽侯、连江、福清、德化、仙游、莆田、将乐、福州、浦城、崇安、光泽、松溪、政和、建阳、建瓯、泰宁、建宁等二十多个县市,广东的广州西村、佛山、三水、潮州、高明、新会、阳江、南海、南雄、封开、惠州、番禺、惠阳、中山、澄迈等十多个县市,也有隋唐宋元时期的青瓷窑址密集分布,而且都不同程度地继承本地六朝青瓷和模仿浙江越窑—龙泉窑系统的工艺,同时还不同程度地兼

烧黑釉瓷器。在浙、闽、粤这个中心区的外围,江西丰城、九江、景德镇、乐平、临川、吉安、赣州、安徽淮南、湖南湘阴、长沙铜官、四川邛崃、山东淄博、河南曲阳、巩县、陕西铜川等地也有一些青瓷窑址。^③隋唐宋元时期以浙、闽、粤沿海地区为中心的高度发达青瓷业,不可否认地继承了东汉六朝时期初创的东南沿海外向型青瓷业传统,也与隋唐宋元时期同样以浙、闽、粤沿海为中心的环中国海海洋社会经济繁荣地带相重叠,因而具有鲜明的海洋文化特征。

除了青瓷业外,隋唐宋元时期青白瓷系、黑釉瓷系、白瓷系等也不同程度地发展并进入以东南沿海为中心的环中国海海洋经贸圈。青白瓷系源于江西景德镇窑,唐宋时期的景德镇窑一直兼烧青瓷和白瓷两种产品,宋元时期出现介于白瓷和青瓷之间的影青瓷、青白瓷,其特征是白中泛青。宋元时期青白瓷的产地集中在东南的闽、粤、赣等省,主要有江西的景德镇、南丰、吉安、安徽繁昌、广东广州、潮州、福建浦城、崇安、政和、光泽、建瓯、建宁、闽清、闽侯、莆田、仙游、安溪、德化、南安、泉州、漳浦,可见福建仿景德镇的青白瓷业后来居上,比江西还发达。黑瓷最早共出于东汉六朝时期江南的青瓷窑址中,隋唐宋元时期闽、粤、赣的大部分青瓷窑都兼烧黑釉瓷器,尤以福建建阳水吉的“建窑”黑釉瓷盏著称、产量最大,仅在福建省内就有浦城、崇安、光泽、邵武、建阳、建瓯、顺昌、南平、泰宁、将乐、三明、尤溪、闽清、闽侯、福州、福清、连江、宁德、德化、晋江、漳浦、长汀、宁化等二十多个县的三十多个窑址中发现了“仿建”,福建以外的江西吉州、广东广州、河北磁县等宋元窑中也有类似的仿建产品。白瓷起源于北朝,隋唐宋元时期的白釉瓷器不仅产于北方的邢窑、巩县窑、鹤壁窑、定窑,同样见于江南的景德镇、吉安、德化、晋江、安溪等闽、赣窑址。此外,以河北磁县磁州窑、江西吉安吉州窑为代表的白釉褐花瓷系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④可见,隋唐宋元时期不但青瓷窑业在东南沿海地区高度发展,青白瓷、黑釉瓷业的发展也以东南闽、粤、赣地区为中心,甚至北方系统的白瓷业在东南的闽、赣等窑址中也有不少仿烧。

隋唐宋元时期东南青瓷、青白瓷、黑釉瓷等

窑场手工业迅速发展,超过了国内其他地区陶瓷手工业的发达程度,其生产规模和产品总量远远超过了国内市场需求,其大部分陶瓷产品应是输出到海外市场的。据《宋史·食货志》、《宋会要辑稿·蕃夷》记载的包括东南瓷器在内的货物输出地有南海、印度洋沿岸地十多个海国,“大食、古逻、阁婆、占城、渤泥、麻逸、三佛齐、宝同朥、沙里亭、丹流眉等并通贸易,以金银缙钱、铅、锡、杂色帛、精粗瓷器,市易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篔簹、玳瑁、玛瑙、车渠、水精、番布、乌、苏木等物”。赵汝适《诸番志》所列的南宋时期交通海外的56个国家中有17个番国与东南海商“博易用瓷器”、“商人以白瓷器”、“青瓷器等博易”、“青白瓷器交易”,最近的是菲律宾群岛上的麻逸、三屿、蒲哩噜和中南半岛的占城、真腊,最远的有东非的层拔。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的元代瓷器输出的番国有44处,除东洋的琉球、三屿、蒲哩噜外,都是从南海到印度洋沿岸的西、南洋航路地区,输出这些地区的瓷器品种有“瓷器”5处、“青瓷”(包括“处州瓷”)20处、“青白瓷”3处、“青白花瓷”16处,主要是浙江、江西、福建的瓷器产品。^⑤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欲得唐货”中更明确指出“以唐人金银为第一,五色轻缣帛次之,其次如真州之铁纛、温州之漆盘、泉处之青瓷器……”,“泉处之青瓷器”正与前述宋元闽、浙沿海的青瓷业繁荣发展的中心地带吻合。

隋唐宋元时期东南地区青瓷、青白瓷、黑釉瓷等外向型瓷业的高度发达和大量外销,在东南帆船为代表的环中国海古代沉船船货瓷器遗存上得到了充分的印证。除了辽宁绥中元代沉船等个别沉船地点很可能与环渤海湾的国内海洋贸易有关外,大部分的黄海、东海和南海隋唐宋元时期沉船瓷器都具有海外贸易的性质。青瓷同样是这一阶段沉船瓷器的最大宗,而且除西沙北礁、印尼爪哇等唐代沉船地点发现的长沙铜官窑系的米黄釉青瓷产品外,珠海外伶仃岛、荷包岛、西沙北礁、南沙郑和礁、永登礁隋唐沉船和韩国珍岛、新安、宁波东门口、连江定海白礁一号、泉州后渚、法石、台山川山岛、珠海蚊洲岛、西沙北礁、全富岛、南岛、南沙郑和礁、

大现礁、南通礁、吕宋博利礁、圣安东尼奥等宋元沉船都有浙江越窑-龙泉窑系和闽、粤沿海的仿越窑-龙泉系的青瓷,而且这些沉船瓷器中的大部分是以该系统的青瓷为主的。此外,韩国新安、宁波东门口、台山川山岛、连江定海、泉州后渚、法石以及西沙、南沙等沉船地点的景德镇和福建德化等仿景德镇的青白瓷系,韩国新安、宁波东门口、连江定海、泉州后渚等沉船地点的建窑系黑瓷、磁州窑和吉州窑系的白釉黑褐花瓷器,也是这一阶段沉船瓷器的重要内涵。而且与这些沉船青瓷、青白瓷、黑瓷、白釉黑褐花瓷相同的瓷器内涵在环中国海外围岛弧带的日本、菲律宾、印尼群岛、马来半岛和印度洋沿岸的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海湾沿岸、北非、东非沿岸等广泛范围内都有发现,^⑥充分再现了中世纪东南瓷器海洋经济与贸易繁荣发展的繁盛局面。

伴随着以外向型的青瓷、青白瓷、黑釉瓷、白瓷窑场手工业的高度发达为代表的东南沿海海洋经济腹地的扩张,以及从东亚岛弧到印度洋两岸广阔地带东南陶瓷的舶出为代表的环中国海海洋经济带的大幅度扩张,作为连接这个巨大的海洋经济贸易体系之陆上腹地与海洋王国之纽带的东南港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中广州、泉州、福州、杭州、明州、广陵等港市在东南海洋经贸体系的繁荣发展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广州是两汉六朝的老港,直到唐宋更为“多蕃汉大商”、“有蛮舶之利”、“通舶出香药”的第一大港口。唐开元二年在广州设“岭南市舶司”,这是唐代国内唯一的市舶司。《新唐书·地理志》录贾耽《广州通海夷道》记载了广州与海外各国的航程,即从广州、屯门山西行,经海南岛东岸,过西沙,穿马六甲,越过印度洋至阿拉伯世界,表明大唐帝国通西洋的海路畅通。两宋政权同样重视广州通商贸易的门户作用,重建市舶司,使广州又恢复至最大贸易港的地位。唐宋时期福州和泉州的港市已经得到一定的发展,福州港直接奠基于东冶故港,历代均为福建政治、经济中心,王审知治闽国时十分重视经营的甘棠港,一般认为其地就是福州或邻近的闽东沿海。何乔远《闽书》载:“穆罕默德圣人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朝,遂传中

国。一贤传广州,二贤传扬州,三贤四贤传泉州”,说明自唐代起泉州的港市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两宋时期,泉州已发展成为一个“有蕃舶之饶,杂货山积”的繁华港市,宋元祐二年(1087年)设立福建路市舶司于泉州,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得以飞速发展,在两宋时期已仅次于广州,南宋末与广州不相上下,元代顺势发展为我国第一大港,被马可波罗(Marco Polo)称为世界最大的良港之一,被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都他(Ibn Batuteh)称为“世界最大海港之一”。隋唐广陵即扬州,是南北交通和物流总汇。《国史补》卷下:“控荆、衡以沿泛,通夷越之货贿,四会四达,此为咽喉”;《唐会要·市》载:“广陵当南北大街,百货所集”。隋唐扬州成为东、西方海路朝贡和贸易内地的重要靠泊港,也是江浙青瓷、丝货精品舶出海外的重要集散地和便捷通道之一。唐末五代扬州遭致战火的洗礼,加之扬州在海陆变迁中逐步远离海口,港市功能从此衰落。宋元时期的杭州直接承袭了先秦汉唐以来的于越国都、会稽郡治和越州州治山阴(今绍兴)在钱塘江南岸的港市功能。大运河开通后河、海相连的交通优势凸显,成为江南丝货、瓷器等华货输出海外的重要集散地。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8年)杭州设立两浙市舶司,成为东南沿海走航高丽、日本的重要港市之一。宁波在隋代为越州,宋元相继称明州、庆元,明初为明州府。五代以来扬州的衰弱更成为明州港发展的契机,北宋端拱二年(989年)在杭州市舶司下辖明州市舶务,至元十四年(1277年)设庆元市舶司,至元三十年(1293年)裁撤杭州市舶司并入庆元市舶司,使宁波港在宋元时期有了空前的发展,成为“南通闽广,东接日本,北距高丽,商舶往来,物华丰溢”的海外贸易大港。^⑥隋唐宋元时期的广州、泉州、福州、庆元、广陵等东南港市交替发展,在以东南沿海为中心的中世纪环中国海海洋经济与贸易体系的繁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东南外向型的以青瓷、青白瓷窑场手工业为代表的腹地经济的海洋联系、对于环中国海岛弧和印度洋沿岸广阔的海洋世界从中国舶来精美的陶瓷商品,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集散和纽带作用。

可见,隋唐宋元时期以东南沿海为中心的海洋经济贸易体系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以东南外向型陶瓷的生产为代表的海洋经济腹地大规模扩张,海洋经济不同程度地辐射到东南以西、以北地带,湖南长沙铜官窑的青瓷、河北磁县磁州窑的白釉黑花瓷等产品相继外销,其生产也受到了海洋世界的推动和制约。同时,东南越窑-龙泉窑系青瓷、景德镇窑系青白瓷、建窑系黑釉瓷等主要的外向型陶瓷的生产规模急剧扩大,单一产品常常出产于几十个县市的几十甚至一、二百个窑口,凸现海洋经济与贸易的超大总量。海外市场也大规模扩张,海洋经济地带从东亚岛弧地带扩大到了印度洋两岸地区。处于陆上腹地与海洋世界中间环节的东南港市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广州、泉州等相继成为东亚乃至古代世界最大海港的行列,成为东南陶瓷海洋传播的重要枢纽。换句话说,隋唐宋元时期以东南沿海为中心的华瓷经济与贸易体系逐步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鼎盛期。

三、明清青花瓷业海洋经济与贸易格局的变化

明清时期是我国瓷器生产与对外输出的重要变革时期,唐宋时期东南青瓷、青白瓷、黑釉瓷和白瓷等单色瓷产业从总体上处于衰落过程中,其地位被起源于唐宋、成熟于元代、繁盛于明清的白釉下青花瓷器所取代。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等彩瓷器赋予明清瓷器以绚丽多彩的现象,但明清瓷器产业的绝对主流是青花瓷。景德镇是唐宋时期的陶瓷重镇之一,元代景德镇湖田等窑址创烧白地钴蓝色彩绘的青花瓷,成为瓷器釉下彩发展的最高阶段。青花瓷这种新兴的瓷器品种迅速成为明清时期我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瓷器手工业的主流,隋唐、宋元时期曾在东南各地盛行的青瓷、青白瓷、黑瓷等传统外向型瓷器手工业窑场迅速衰退,虽还有不同程度的延续生产,但质量和产量大不如前。尤其是明代开始在景德镇设立宫廷御器厂,促进了景德镇青花瓷器工艺和产品质量的提高,也带动了民众对青花瓷器的青睐和民窑青花瓷业的加速发展。嘉靖《江西大志》“陶书”说,明

代青花瓷器“自燕云而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皆取于景德镇,而商贾往往谋大利”;而且民窑的青花瓷工艺也源于官窑,明代兰浦《景德镇陶录》卷五说,“崔公窑,嘉隆间人,善治陶,多仿宣成窑遗法制器,当时以为胜,号其器曰崔公窑瓷,四方争售”,“为民窑之冠”。由于官窑的发展,民窑的扩大,景德镇因此成为明清瓷都,明清青花瓷的工艺中心。^⑧

在明代早期的朝贡贸易体系中,以景德镇为代表的青花瓷器通过各种方式大量输出到海外,尤其是郑和下西洋期间东南瓷器在西、南洋航路上的走俏仍然延续了宋元时期的局面。巩珍《西洋番国志》“爪哇国”条记载:“国人最喜青花瓷器并麝香、花绣、紵丝、硝子珠等货”,占城、锡兰条下也有类似的描述;马欢《瀛涯胜览》“爪哇国”也说“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费信《星槎胜览》所记与我国有瓷器贸易的国家有28处,其中瓷器和青花瓷器有23处,其余5处为青瓷和青白瓷器。随着外销的推进,青花瓷器皿在国外社会生活中也逐步取代了传统的青瓷、青白瓷种,相继占据主流地位,而且晚明以来随着葡、西、荷、英、法、瑞、美等欧美洋船相继突入环中国海贸易圈,以东南青花瓷器为代表的华瓷海洋贸易圈从印度洋扩展到大西洋,被大量贩运到欧美各国。据有关记录统计,明清时期欧洲各国商船运走的中国瓷器数量十分庞大,如1573年经中美洲阿卡普尔科往西班牙的两艘马尼拉帆船就运载有2万多件中国瓷器;1603年荷兰人在南海柔佛海面劫走的葡萄牙商船“圣·凯瑟琳娜”(Santa Cathalina)号上获得了10万件瓷器,被拉到阿姆斯特丹拍卖,1623年荷印公司(新)“毛里求斯”号商船从巴达维亚运走了近6万4千件中国瓷器;年度数字方面,1614年巴达维亚总督写信给荷印公司董事会的信中报告将运回中国瓷器35万件;1636年6艘荷印商船运回中国瓷器26万余件的中国瓷器;广州口岸方面,1741年间英国从广州运走瓷器844箱、荷兰600箱、瑞典800箱、丹麦400箱;1777、1778年英国从广州运走瓷器348吨、荷兰111吨、法国100吨、瑞典99吨、丹麦39吨。^⑨明清瓷风风靡欧美,是东南瓷业海外贸易格局的一个重要变化。

欧美世界对中国青花瓷器的大量需求,给东南青花瓷器带来了更加广阔的市场,这个市场的需求总量是前所未有的,无疑极大地刺激了东南外向型青花瓷业的发展。就是在这个海外市场扩展的背景下,明代中后期以来,以明清景德镇窑业为楷模的青花瓷手工业迅速扩展到东南沿海,在闽粤沿海出现了大批仿烧景德镇青花瓷的窑场手工业。尤其是福建沿海,经考古调查的明清时期青花瓷窑在闽江流域中上游的浦城、政和、武夷山、光泽、建阳、南平、屏南,以及闽南沿海晋江、九龙江流域的永春、德化、安溪、南安、厦门、漳浦、长泰、华安、南靖、平和、诏安等20多个县发现了数百处,其中安溪、德化等县就分别发现了百处以上的青花窑址,充分显示出明清时期青花瓷器在福建沿海陶瓷手工业中的主导地位。邻近的广东沿海揭阳、饶平、兴宁、大埔、平远、惠来、惠东、海丰、廉江、罗定、始兴、博罗、佛山等十多个县也发现了类似的明清青花瓷窑口。闽粤沿海的明清青花瓷业既有本地传统瓷业工艺的继承发展,但更多的是接受了来自明清瓷都景德镇的影响。^⑩景德镇瓷业素有“工匠来八方,器成走天下”^⑪的传统,明代中叶以后由于青花瓷器海外市场的不断扩大和闽粤沿海的海洋通商之便,吸引了大量景德镇窑工前来开窑制瓷,所以闽粤的青花瓷与景德镇有密切的渊源关系,以至于闽粤青花瓷器的造型、纹饰等主题都可以找到模仿景德镇的影子,而因原料等的不同,在胎、釉、青花色泽等内容上略有差别。因此,明代中晚期以后的闽粤赣地区的青花瓷窑业实际上是一个共同的社会文化体系,而维系这个体系的纽带应主要是海外巨大的瓷器市场对中国东南的拉动力。所以,景德镇和闽粤沿海的青花窑址中都出现一批器型和纹饰专门满足国外社会生活需要的外销品种,甚至洋船还带来了欧洲市场所需器皿的样品送到景德镇的窑场去订单生产。尤其是清代英、法、荷、丹、瑞等国在广州设立商行后,多直接向景德镇等窑场送去欧洲所需瓷器的木制、陶制或图画的订货货样。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器除部分满足国内社会生活需求外,大量通过赣江-北江间的水陆通道运输到广州或爬山越岭运到漳州月港集散,先后通过

中外帆船运往西、南洋和西欧各国。闽、粤沿海的明清青花瓷窑场手工业的海洋文化色彩更加鲜明,尤其是闽南沿海的青花瓷器先后通过九龙江口的漳州月港、厦门港运输到北洋、东洋和西南洋各地,并由洋船接舶到欧美各地。总之,明清时期以闽、粤、赣三省青花瓷产业的发展,延续了东南沿海历代外向型瓷器手工业体系,是明清时期东南海洋社会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

明清时期的华瓷沉船数量激增,就是东南外向型青花瓷窑场手工业发展的一项重要证据。除了日本濑户内海友岛、浙江宁波象山、连江定海白礁二号、澎湖将军一号、海南文昌宝陵港、西沙北礁、全富岛、珊瑚岛、南沙洲、南岛、北岛、东岛、金银岛、南沙郑和礁、道明礁、福禄礁、大现礁、皇路礁、南通礁、越南海岸富国岛、昆仑岛、泰国湾帕塔亚、西昌岛、科拉德、印尼斯特霖威夫司令礁、“泰兴”号、马六甲海峡“皇家南海”、“龙泉”、“宣德”、“南洋”、菲律宾皮托加拉、皇家舰长暗沙二号、潘达南等众多明清时期的东南帆船沉址外,还有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广阔水域的四十多处与明清青花瓷器交易有关的欧美洋船沉址。这一时期的东南帆船与大量的欧洲洋船沉址上占绝对优势的是景德镇窑系、仿景德镇的漳州窑系和闽粤沿海的民窑青花瓷器,少量龙泉窑和仿龙泉窑系的青瓷产品。正如前节所述,据欧洲各国有关档案,这些洋船中的许多就是满载东南瓷器离开广州或马尼拉、巴达维亚等远东货物集散地的。此外,近到环中国海的日本、菲律宾、越南、泰国、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远到印度洋两岸的印度、斯里兰卡、伊朗、阿富汗、土耳其、埃及、索马里、坦桑尼亚,以及葡萄牙、荷兰、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瑞典、丹麦、比利时、格鲁吉亚、俄罗斯、美国等近古以来中国帆船和欧洲洋船航迹所到之处,陆上考古发现中也广泛、大量地发现了明清东南青花瓷器。^②可见,到了明清时期,以青花瓷器海外市场为代表的东南沿海海洋经济文化体系较之前代获得了巨大的扩展,东南海洋经济的海洋辐射力几乎遍及有人类居住的世界五大洲。从沉船考古资料来看,正是中国东南帆船和欧美洋船所共同编织的近古远东海洋贸

易网络将这些精美的东方青花瓷器传送到世界各地。

明清时期赣、闽、粤青花瓷窑场手工业的发展代表了具有千百年历史的东南海洋社会经济之陆上腹地的持续发展,并伴随着东南海洋社会经济体系之海外市场的巨大扩张,而处于这两个陆、海经济带之中间环节的明清东南港市在发展变化之中继续发挥重要的集散与纽带作用。明清时期正值中国封建社会经济衰退与资本主义经济萌芽、闭关锁国的保守主义与西方入侵的殖民势力持续较量,在这一矛盾的时代背景下的明清王朝海洋政治一直摇摆于禁海与开海的不定变局中,明清东南港市的发展、变化受到了这一背景的深刻制约。这一时代东南港市发生的主要变化是,局限于朝贡贸易的传统港市在短暂繁荣后逐步衰退,而私商势力逐步强大、私商口岸在海洋社会经济巨大利润的诱惑下相继顽强地活跃于东南沿海,并直接带动了东南沿海诸港朝着近代化的方向发展。^①明清时期以景德镇窑系的青花瓷器为代表的海洋性瓷器的对外输出主要是通过粤港市集散、中转。明代广州是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的朝贡港,据《明史·食货志》,“洪武初,设于太仓黄渡,寻罢。复设于宁波、泉州、广东。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永乐)三年,以诸番贡使益多,乃置驿于福建、浙江、广东三市舶司以馆之。福建曰来远,浙江曰安远,广东曰怀远。”广州港市在很长时间内垄断了西、南洋航路上的朝贡贸易,甚至在嘉靖二年(1523年)还一度废除闽、浙市舶司,“俱在广州,设市舶司领之”,^③成为控制东、西洋朝贡贸易的唯一港口,“广州传播往诸番,出虎头门,始入大洋分东西二路,东洋差近,西洋差远。”^④同时违禁下海通番的私商港市在珠江口的屯门、浪白澳及闽粤间的南澳等地兴起,这些昔日荒芜的小岛一时成为海陆货物的集散地和私人海上贸易的重镇,并引起了西方早期殖民者的垂涎,正德年间,葡萄牙使臣与中国发展通商关系的要求遭到明王朝拒绝后,葡军就短暂占领了屯门、浪白澳等地,试图占据通商之利。私商的大规模违禁下海通番、欧洲洋船的不断进逼,迫使明王朝首先废止了广东海禁、改

革朝贡贸易体制,据《明世宗嘉靖实录》卷一〇六,嘉靖八年(1529年)“令广东番舶例许通市者,毋得禁绝”,对于海外商船一律征榷关税放行,葡、荷、英等欧洲洋船相继靠泊广州港。清初短期禁海平台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就废除海禁,“令出海贸易;以彰富之治,得旨开海贸易”,并在广州、漳州(雍正六年即1728年移厦门)、宁波、云台山分别设置粤、闽、浙、江海关,海外贸易迅速恢复,“商船交于四省,偏于占城、暹罗、真腊、满喇加、渤泥、荷兰、日本、苏禄、琉球诸国”。^⑤推动了广州等东南海港在与欧洲洋船势力的直接和间接贸易中朝着近代港市的的发展方向发展。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因英国商人“洪仁辉事件”而再度关闭了闽、浙、江海关,“嗣后口岸定于广东”,“止许在广东收泊贸易”。^⑥广州成为独口通商口岸后,获得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港市地位和功能远远超过了东南沿海其他海港,英、法、荷、丹、瑞等国相继在广州设商行,经营包括东南瓷器、丝织品、茶叶等中国商品,广州以环中国海第一港市的地位长期垄断了西、南洋与亚欧航路贸易,直到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②明清时期以闽南漳州窑、德化窑青花瓷为代表的海洋性陶瓷的对外输出主要是通过闽海港市的集散和中转。明初泉州、福州老港维持着朝贡贸易港的地位,洪武年间设市舶司于泉州,成化八年(1472年)福建市舶司由泉州迁至福州,为明朝通琉球的朝贡贸易正口,“琉球国往来使臣,俱于福州停住”。明代中叶以后泉州、福州的港市地位迅速很快衰落,私商港市主要繁盛于九龙江口,首先是漳州龙海海澄月港兴起,私商海外贸易屡禁不止,成为明代中晚期福建最重要港口。《明世宗嘉靖实录》卷一五四:“漳民私造双桅大船,擅用军器火药,违禁商贩”;《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六:“时漳州月港家造过洋大船,往来暹罗、佛郎机诸国,通易货物”;卷一百二十:“正德十二年(1517年), (广东)有司自是将安南、满刺加诸番舶尽行阻绝,皆往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驻扎,于是利归于闽,而广之市萧然矣”,“市舶官吏公设于广东者,反不如漳州私通之无禁”;《嘉靖东南平倭通录》语:“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继嘉靖平定后,明

王朝不得不于隆庆元年(1567年)准许月港开禁,获得合法地位的月港海外贸易更加繁盛,“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脍脍,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⑦一时间月港的通商辐射遍及海外诸邻,张燮《东西洋考》所录的月港海外贸易达西、南洋海域的交趾、占城、暹罗、下港、柬埔寨、大泥、旧港、麻六甲、哑齐、彭亨、柔佛、丁机宜、思吉港、文郎马神、迟闷,东洋的吕宋、苏禄、猫里务、沙瑶、呐啤、美洛居、文莱、鸡笼、淡水,以及日本、荷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海后,清政府在漳州设闽海关,成为东南沿海四大通商港市之一。月港衰落后,厦门的港口地理优势突显,“据泉漳之交,扼台、澎之要,为全闽之门户,番舶之所往来,海运之所出入”,明末清初郑氏的经营也推进了厦门港口的发展,“凡中国各货,海外皆仰资郑氏,于是通洋之利,惟郑氏独操之”。雍正六年(1728年)闽海关由漳州移至厦门,成为清代前期合法的通商四口之一,“贩洋贸易船只无分大小,络绎而发,只数繁多”;港口辐射环中国海各地,成为东南沿海最重要的海洋贸易集散地,“大小帆樯之集凑,远近贸易之都会也,自担门东渡黑洋至于台湾,上接沙埕,下连南澳,据十闽之要会,通九译之番邦”,“服贾者以贩海为利藪,视汪洋巨浸如衽席,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外至吕宋、苏禄、实力、噶喇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则获利数倍至数十倍不等,故有倾产造船者。”^⑧^③虽然明清时期浙江海洋性瓷业处于衰退过程,但包括瓷器外销在内的海洋经贸体系并未完全终结。在浙海港市方面,明代前期宁波老港维持着朝贡贸易正口的地位,《明史·食货志》,洪武年间市舶司“设于宁波、泉州、广东。宁波通日本……”;永乐年间又在宁波设“安远驿”接待来自日本的贡使。此时与闽、粤沿海私商口岸繁荣之势遥相呼应的是,宁波海外的双屿港跃然浙东沿海,很快成为海禁后江浙沿海走私通番的据点,浙海私商为拒抗禁海,多逃聚双屿,通西南洋、接日本,经营大规模的走私贸易。夏燮《明通鉴》卷九五说,明初包括来自葡萄牙、日本的海商在内的中外私商集结达万人以

上,屡禁而不止,直到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被朱纨捣毁。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海设四口通商,其中宁波设浙海关,宁波海外贸易迅速恢复,商船达于东海、南海各国,港市再度繁荣。从总体上说,虽然明清港市格局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并不影响以青花瓷器的生产和输出为代表的明清东南海洋社会经济体系发展、壮大的大局,东南港市始终摆脱不了沟通、联结东南地区海、陆社会经济的纽带作用。

总之,明清时期以东南沿海为中心的海洋社会经济体系虽然遭遇了中原王朝持续的限制性海洋政治的强力制约,仍顽强地发展、壮大。以景德镇窑和仿景德镇窑系的青花瓷为代表的海洋性瓷业持续发展,对外辐射的空间范围更加广阔,从印度洋两岸推进到了大西洋两岸,表明千百年来形成、发展的以东南沿海为中心的、以华瓷产品为代表的海洋社会经济内涵的强大生命力和对世界的影响力。

注释:

- ①李德金:《古代瓷窑遗址的调查和发掘》,载《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 ②矢部良明:《日本出土的唐宋时代的陶瓷》,《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三辑,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等1983年印;三上次男:《陶瓷之路》第153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第4页,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年;《中国古代与南洋之陶瓷贸易》,《中国航海学会年刊》1955年。
- ③李德金:《古代瓷窑遗址的调查和发掘》,载《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栗建安:《福建古瓷窑考古概述》,载《福建历史文化与博物馆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
- ④李德金:《古代瓷窑遗址的调查和发掘》,载《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栗建安:《福建的建窑系黑釉茶碗》,载《唐物天目——福建省建窑出土天目与日本传世天目特别展》,日本写真印刷株式会社1994年。
- ⑤冯先铭:《元以前我国瓷器销行亚洲的考察》,《文物》1981年6期;彭适凡、詹开逊:《岛夷志略中的“青白花瓷器”考》,载《中国古代瓷器的外销》,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青白花瓷器续考》,《江西文物》1990年2期。
- ⑥冯先铭:《中国古代瓷器的外销》,《海交史研究》第二辑(1980年);《元以前我国瓷器销行亚洲的考察》,《文物》1981年6期;三上次男:《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
- ⑦王元恭:至正《四明续志》卷一“土风”。
- ⑧冯先铭主编:《中国陶瓷》第五编“明代景德镇瓷器生产概说”、“清代景德镇瓷器概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甄励:《明代景德镇民间青花制瓷业述略》,《景德镇陶瓷》1986年3期。
- ⑨李金明:《联系中国与拉美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交史研究》2001年2期;《明清时期中国瓷器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2期;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第283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
- ⑩罗立华:《福建青花瓷器的初步研究》,《东南考古研究》第一辑,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福建省博物馆:《漳州窑——福建漳州地区明清窑址调查发掘报告之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 ⑪[明]兰浦:《景德镇陶录》卷八“陶说杂编”。
- ⑫冯小琦:《景德镇民窑青花瓷的对外传播》,《景德镇陶瓷》1986年3期;冯先铭、冯小琦:《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瓷器》;叶文程、罗立华:《中国青花瓷器的对外交流》,均载《江西文物》1990年2期。
- ⑬《明史》卷三二五“外国传”。
- ⑭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二十“海外诸番”。
- ⑮《清圣祖康熙实录》卷一一六;《重纂福建通志》卷八十七“海防”。
- ⑯《东华续录》卷四十六“乾隆朝”。
- ⑰周起元:张燮《东西洋考》“序”。
- ⑱施琅:《靖海纪事》卷下“海疆底定疏”;清周凯《厦门志》卷二“形势”,卷十五“风俗记”。